

# 柏林圍牆倒塌三十週年的時代意義

●杜子信／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 壹、前言

1989年年底之前，在中歐心臟地帶的兩個同屬德意志民族的國家：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簡稱西德）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簡稱東德），隔著柏林圍牆及兩德界牆而遙望對峙。這兩個在本質上有著截然不同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結構及價值體系的國家：經濟上奉行資本主義社會市場經濟體制與社會主義統制經濟體系之差異、國體上施行聯邦自治與中央集權制之歧異、政府體制上遵行多元民主政體與統制式的勞動暨農民國度之迥異、個體發展上聽任個人發展自身長才與厲行集體式價值觀之區別、社會體制上透過經濟成長而逐步建構完整的社會福利體系與由國家建構出的高度安養及照護體系之不同，以及國際體系上隸屬西方民主自由陣營的歐體（日後的歐盟）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與東方共黨一黨專政的東方集團及華沙公約組織（WTO）之差別。數十年來，兩個德國隨著東西兩陣營意識形態尖銳對立而僵持對峙的敵視之態，終在以蘇聯為首的東方集團因長期深陷與美國軍備競賽，從而使其經濟財政不支而全面破產，並進而引爆的一系列政治危機狀態下，最後使得東方集團各國共黨政權在1989年的進程中，先後瓦解垮台。在這整個1989年的所謂「蘇東波」變局中，尤以柏林圍牆的倒塌而達到這股時代風潮的最高點，該年11月9日在東德群眾蜂擁推倒柏林圍牆後，終於瓦解了東德共黨政權，其後且在翌年的1990年10月3日促成了德國的「再統一」（Wiedervereinigung）。

## 貳、柏林圍牆倒塌三十年後的德國社會概觀

這場曾被日裔美籍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譽為「歷史的終結」的紀元，甚至下了人類文明歷經數千年的不斷摸索與嘗試之後，民主自由的意識形態終於戰勝了一黨專斷的極權體制、自此之後將成為人類文明最後亦是最適宜的生活方式的評論。然而時至三十年之後的今日，在回首此一重大歷史紀元之餘而盱衡全球的民主自由之路的發展，顯然與福山當初所推導的結語，有著相當程度的落差，甚至可以說無論就德國、歐洲或全球各國而言，民主自由前景仍面臨著各國內部紛擾，以及新型態威權及

專制政體逆流的衝擊與挑戰。

就德國內部而言，自從柏林圍牆倒塌及兩德再統一之後，隨著初期德東民眾歡欣鼓舞地迎接西方式民主自由，以及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的熱潮過去之後，緊接而來者卻是因德東各地基礎建設不佳、產業缺乏競爭力、職缺有限，以及薪資低落的情形下，導致大量人口離開德東故鄉，前往德西尋求較佳的生活條件。儘管德國政府在此一期間，已經投入大筆的資金於包括柏林在內的德東各地的各項產業的建設，以及基礎設施及市容的更新之上，卻仍難以扭轉德東先天失調的劣勢。總計過去三十年以來，德東已流失了將近三百七十萬的人口，即令同一時期，德西亦約有兩百四十餘萬移向東部，然而西移者絕大部分皆為青年人口，使得德東在面臨青壯勞動人口持續減少的狀況下，影響大型產業的進駐意願，同時更面臨了嚴峻的人口老化的威脅。

就柏林圍牆倒塌三十年之後的今日來針對前東德地區及東柏林作一全面觀察，可以發現，除了少數重點城市，諸如因轄區擴大並涵蓋前東柏林市區而成為德國首都的柏林，以及少數或因工商業重地所在的萊比錫（Leipzig）、或因觀光業興盛的德勒斯登（Dresden）、波茨坦（Potsdam）及威瑪（Weimar）等等，能夠吸引相關產業進駐及人口移入而展現欣欣向榮的態勢之外，其餘德東大部分地區普遍呈現人口持續流失及生機日衰的頹頹破敗之象。根據最新統計，德國最先進的五百大產業之中有四百六十四家的總部位於德西，只有三十餘家設立在德東，此種現象正是說明了德東生產力遠較德西來的低落許多，事實上按照政府相關部門的調查也證實了德東的平均生產力落後德西地區超過20%以上，因此德東受薪階級的平均薪資所得自然也僅能達到德西的八成而已。這種因長期東西產業及經社結構的不同所導致的差異，始終無法在兩德再統一之後的年代中逐步弭平，因此在過去的三十年之中，德東地區的民眾不免逐步心生次等公民之嘆。

在歷時數十載以來青壯人口的持續外流及產業薪資結構的困境下，經年累月後所逐步引發的不滿中央政權的情緒，也在德國民情輿論上造成了長期的東西鴻溝及疏離感，並對德國政治上產生愈見強大的衝擊。首先過去數十年以來以左翼政黨為名的原共黨勢力，漸漸取得德東政壇的一席之地，甚至成為若干邦政府聯合政府的組成政黨之一，他們成為德東人民長期鬱鬱難伸的情緒出口管道。此種德國東西部疏離乃至於摩擦的現象，尤其到了近兩三年來更為惡化。緣自2015至2016年難民危機的爆發，歐洲聯盟在德國總理梅爾克（Angel Merkel）基於人道立場而作出接納其入境並安置於全德各邦的決定下，大批源自西亞及北非的穆斯林難民湧入了德國全境。面對著思維行為模式及價值觀截然相異的大批異文化圈的人群湧入、並分食德東原本就已較低的經濟發展及社福資源的狀況下，終而全面引爆了德東民眾的強烈怒火，他們將長期以來揮之不去的二等公民之怨，藉由對大批陌生外來者的憤怒中而反映於選舉模式之上，遂導致一支新興的右翼政黨——另類選項黨（AfD）自2018年以來在全德、尤其是德東各邦的邦選舉中大肆攻城掠地，得票率甚至逼近三成，其影響力一舉取代了原本作為德東民眾利益首要代言人

的左翼黨，此一結果對德國內政上的衝擊不言可喻，各界普遍擔憂右翼勢力是否在德國政壇上進一步坐大。

儘管表象上當前德國政壇的右傾，不禁令人心生昔日納粹極權政體是否死灰復燃的憂慮，實則深入觀察之後，德東地區右翼勢力的興起，本質上與實際情形上與二戰前的德國頗有相當程度的差異。首先當前德國政壇的右傾現象並不帶有全國性的趨勢，幾乎僅侷限於德東地區，德西地區雖然另類選項黨亦在各邦議會上保有議席，但尚不具有可觀的政治影響力。其次，經過二戰結束後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七十餘年的民主教育的薰陶，以及兩德再統一後三十年的轉型正義的推動，德國社會輿論對於狹隘的種族主義及激進的民族主義思想，明顯保持相當的距離，因為絕大部分民眾普遍了解到過去德國兩度在極權政體——納粹德國的白色恐怖及共黨東德的紅色恐怖——統治下，對全民族所帶來的災難性後果。因而現今德東政壇的右傾現象，主要原因還是因德東人民三十年來因產業社會轉型困難而所造成的低薪及不受重視，致而引發其長期作為二等公民的怨懟，藉由對大批突然湧入的陌生異文化宗教的恐懼心理而爆發出來，此種情緒在短期內或將導致右翼政黨取得德國政壇、尤其在德東地區相當程度的影響力，但此種氛圍若要說會進一步導致德國重回極權政體的懷抱，恐是言過其實了。

事實上，這一兩年以來德國政府也已察覺德東經濟及社會問題的日漸嚴重性，致而積極謀求改善德東經濟體質的先天缺失，尋求創造德西德東的「同等的生活條件」，意即透過具體優惠的措施而吸引外資進駐德東各地，希望藉由德東地區經濟的逐步復甦與繁榮，提升該地物質生活的環境，藉此改善德東人均收入長期以來不如德西的窘況，進而從根本上消弭德東民眾在未來投票支持右翼政黨的潛在動能。此種釜底抽薪之策，或許在短期內尚難以改變德東人民因自覺身為二等公民的怨懟而所採取支持右翼的投票模式，但長遠來看，德東經社體質在未來若能因德西及外資的投入後產生顯而易見的改變，威信將有望消弭右翼勢力持續坐大的威脅。

### 參、柏林圍牆作為德國民主教育的重心

當然過去德國中央及地方政府對民主教育的徹底落實，尤其是抑制右翼勢力之再起的一股關鍵力量。事實上，從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自1949年的建立以來，德國中央政府向以過去慘痛的歷史教訓而強力捍衛民主自由及人權的價值，並以之作為中央政府施政的重心，其主要呈現的方式有二：推動轉型正義及強化民主人權的教育。在轉型正義部分，從1960年代末期至今，透過對大批檔案資料的解密及相關線索的搜尋，不斷追究在納粹加害者所應賦予的政治責任，1990年兩德再統一之後，此一追究極權政權迫害人權的犯罪首謀的行動，亦擴及於東德政權時期。透過訴訟審判而將之繩之以法及定罪，與此同時則給予受害者應得之賠償並回復其名譽。

除了轉型正義行動的持續推行之外，德意志聯邦政府亦透過教科書的精心設計而強

化對民主、自由、人權及法治的生活方式。舉凡過去納粹及東德共黨所犯下的戰爭罪行、屠殺迫害及對人權傷害的種種違反人道惡行，皆鉅細靡遺地詳載於各級教科書上，讓自由、多元、寬容及理性的精神從小即深深扎根在學子們的腦海之中，並進而使之逐步內化於其思維行為模式之中。當然德國教育體系貫徹對民主、自由、人權及法治的重視，絕非僅見之於教科書本的內容之中，同時也藉由現存各地的歷史陳跡與建物來作為警訊教育，其中殘存的柏林圍牆正是今日德國在捍衛民主機制及防範極權勢力再度興起的一項鮮活的歷史教材。

今日柏林市內的舊有柏林圍牆遺跡，僅剩極少數殘餘斷垣，德國政府之所以不願將之全面拆除之因，即在於希望藉之提醒全德人民莫忘昔日極權政體對於德國乃至於全歐所造成之創痛。這些僅存的柏林圍牆之殘垣斷壁中，尤以位於下基爾欣納街（Niederkirchner Strasse）的被命名為「恐怖地形圖」（Topographie des Terrors），以及貝恩瑙街（Bernauer Strasse）地鐵站旁的「柏林圍牆紀念地」（Gedenkstätte Berliner Mauer）的兩處柏林圍牆遺址地帶，最具絕佳的歷史教育功能。係因這兩處殘餘的柏林圍牆帶不僅是現存的柏林圍牆中保留較為完整的兩段，更因為這兩段圍牆殘址所在之地，分別是昔日兩大極權政體：納粹德國及東德共黨政權的政治軍事重地矗立之處，以及許多東德人民冒死逃離卻不幸命喪讓該處之地，因而要控訴昔日獨裁極權體制之禍害，這兩段圍牆帶可謂是絕佳的歷史見證物。

毗鄰下基爾欣納街的「恐怖地形圖」的殘餘柏林圍牆帶兩側，昔日曾經矗立著兩大獨裁極權政體的各棟政軍建築物。首先在1933至1945年的德意志第三帝國時期，此地為納粹黨人的秘密警察總部（蓋世太保／Gestapo）、黨衛隊（SS）及帝國保安處（SD）的本部，在1939至1945年的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黨政高層所作出在全歐所執行的各項恐怖行動的決策，皆由此處所發佈。二戰結束後，此地作為恐怖行動發號地的角色迅即無縫接軌地轉移至東德共黨手中，1949至1989年間，東德共黨將其黨政辦公重心置於此區，成為共黨總理府、總書記本部及共黨政權嚴密掌控東德全境的中樞首腦重地，東德共黨國家主席兼總書記烏爾布利希特（Walter Ulbricht）在1961年6月時猶信誓旦旦地宣稱，東德共黨體制的高度優越性，因而絕不會興建圍牆以防民眾的越境逃亡，殊不料僅僅兩個月之後，一道阻絕通往自由之路的高聳圍牆就在一夕之間被豎立起。

在環繞著恐怖地形圖柏林圍牆帶兩側周遭的各棟建物遺址旁，則有一棟主要展覽館，內部以展出納粹政權統治柏林及德國十二年所帶來的鉅大浩劫為主軸，首先詳細說明1933年納粹黨人是如何利用先前威瑪共和時期政經社危機而崛興的歷程，希特勒及其納粹黨人在這個亂局中奸巧地運用個人及黨機器的宣傳機器，大肆魅惑了處於極端絕望的德國民眾，終使其全面「攫取德國政權」（Machtergreifung），隨即將德國全面納入極權國家體制而運作，嚴禁任何反對異議聲音，違者皆身陷囹圄，形成了一個恐怖統治的警察國度，納粹黨人也就在全面牢控政權之後而一步步地執行其對外擴張的野心，終



而導致了二戰的爆發，並使全德乃至於全歐深陷生靈塗炭的悲劇。其後則以1945年4至5月納粹黨人的末日作為展覽的另一大主軸，透過幾乎化為荒原廢墟的德國各大城市慘狀的照片，來凸顯當時已深陷絕境且即將面臨最後審判的納粹黨人人性泯滅的最終結局：大批黨政高層為了逃避未來遭追究其所犯下的戰爭罪行而遭受審制裁，因而不惜親手執行全家自裁了斷的行徑，並以其至死仍根深柢固的種族意識形態思想而妄稱，既然第三帝國的戰敗已無由可免，則優秀的德意志民族已無繼續存在於世的必要性，但在納粹德國行將敗亡之際，亦必以全世界的同步毀滅作為代價：「我們決不投降，決不，我們或將步向最後的失敗，但在步向毀滅之時，我們也將拉著全世界一起陪葬。」就七十餘年後的今日觀之，仍不免為獨裁政權的瘋狂恐怖行徑所震驚。

位於貝恩瑙街（Bernauer Straße）地鐵站旁的「柏林圍牆紀念地」，亦同屬深具教育功能的柏林圍牆遺址。此一紀念地位於柏林市區的正中央，在昔日東西德分立對峙期間，係屬雙方分界線之所在。這段柏林圍牆所在之處，由於毗鄰昔日東德黨政要地之故，因而成為東德邊防哨的重點佈防之所在，從今日殘餘的圍牆分佈處，即可窺見當時這段柏林圍牆的戒備森嚴及滿佈肅殺的氛圍。今日該處絕大部分的圍牆皆已拆除，並以一片片滿佈塗鴉及殘缺不全的圍牆並排矗立，彰顯以所謂人民共和國為名的東德共黨極權政體竟是透過圍牆來箝制及囚禁其人民自由行動的諷刺性。兩德再統一之後的柏林市政府在聯邦政府的支持下，為了彰顯其所具之歷史教育的功能，因而透過精心的策劃而使之重現昔日惴慄陰森情境。今日柏林圍牆紀念地的遺址帶尚保留了一小段較為完整的圍牆，是為昔日的外牆，另外稍遠則有一段則矗立著一整排的鐵製欄杆，是為昔日的內牆之所在，取代了先前被拆除的圍牆。內外牆之間則是所謂的「死亡地帶」，這是一片空曠地帶，過去此地帶內滿佈著各種陷阱及障礙物，防止東德人民脫逃，即令有人成功攀越內牆，然而進入這空曠的死亡地帶，就立刻成為東德邊防士兵的瞄準的標靶。雖則如此，但仍無法阻絕人性之中對民主及自由生活方式的渴望。總計從1961年圍牆建立一直到1990年被拆除為止，計有成千上萬的東德民眾透過攀爬及挖掘地道，穿越這道柏林圍牆而前往西柏林，5,000餘人成功抵達自由世界，但仍有3,221人橫遭逮捕，另外有260人受傷而被截回，更不幸有239人則因此而遇害。柏林圍牆紀念地旁矗立著一道生鏽的鐵牆，其上則安置了受難者的遺像，在冷峻陰森的內外牆夾處的死亡地帶中，格外凸顯了在專制社會下的人性對自由的深沉渴望及不自由無寧死的決心。

柏林圍牆紀念地的展示場址中另設有柏林圍牆文獻資料中心，扮演著重要的歷史教育功能之用。該中心的一樓展館陳列了昔日東德政權為了緊緊其政權於不墜而不惜藉由耗費鉅資，從而建造起高聳的圍牆來隔絕東德民眾的外逃的相關文件及設施。中心展場上，透過一件件為尋求自由而命喪於斯的這200餘名的東德受難者的資料呈現，彰顯在極權政體統治下的東德民眾為了追求民主、自由及人權的價值，不惜付出自身的生命代價的心聲。至於二樓展館，則展示了1989年東方集團國家在面臨共黨政權先後垮台的危機下，東德共黨政權終而不支崩解的大批影音及文獻資料，內容陳述自1949年東德政權成

立後歷經四十年的共黨專制統治之後，政治、經濟與社會等問題弊端叢生，最後在深陷沉疴難解及前景無望的絕境下，東德人民被迫不得不想方設法逃離此一國度，但受限於柏林圍牆及東西德邊界界牆的阻擋，於是大股人群先是湧向鄰近的東方集團國家諸如捷克及匈牙利，再轉往西德，然而終究阻擋不了強大民怨的爆發。在1989年年中至年底間，大批東德民眾紛紛走上街頭，萊比錫、德勒斯登及東柏林等東德各大城市接連出現大規模群眾抗議事件，群眾甘冒當局強力鎮壓的危險而起身抗議專制政權的高壓統治，殊未料貌似強大牢固的東德共黨政權，卻在共黨內部開明之士取代強硬份子及邊界哨所誤解上級命令下，開放了東西柏林的邊界管制哨，進而導致了柏林圍牆的全面倒塌，開啓了翌年（1990）10月3日的德國再統一的契機。藉由這段東德政權由嚴密高壓控制到最後橫遭「蘇東波」浪潮衝擊而土崩瓦解的展示歷程，強調在追求民主自由及人權價值所必須付出的血汗及犧牲，彰顯現行民主政體得來之不易。

#### 肆、柏林圍牆倒塌三十年後的民主危機

然而若就柏林圍牆倒塌三十年後的今日世局來觀察，誠如本文先前之所言，民主自由及人權的價值無論就德國、歐洲及全球各地而言，卻是面臨到新形態的威脅而仍難能認定其可永保長存無虞。由於近一、二十年以來網路科技的快速發展，造成新聞訊息的快速及鉅量傳播，此一發展就正面而言，各國政府若有貪贓枉法及侵害民瘼之舉，極易引發民眾透過網路迅速糾集抗爭群眾而對政府施壓，諸如先前的阿拉伯之春爆發後所導致許多威權政府下台的案例，從而使之步向民主化的進程，即令因初期的水土不服而造成短期政局動蕩的現象，卻仍有著初步民主化的嘗試。然而就負面面向而言，若干專制及獨裁政權卻也從中見識到網路世界不受控制的特點，因而為了確保其政權的不受國內異議人士的挑戰，因而精心建構出所謂的天網監控及網路實名制系統，嚴密監控國內民眾網路活動的種種踪跡，同時並阻絕與國外網站之間的聯繫，並且透過人臉辨識系統的建構而達到對全國上下的全方位控制，從而確保其極權政體的不受威脅。此外，這類的專制政權不僅對其國內採行嚴密監控的手段，同時亦透過對其所打造的天網監控系統而將其對外的政治野心付諸實行。他們利用了網路科技日新月異之下，所產生的資訊爆炸下真假訊息交錯並行的現象，以之而大舉介入及干涉他國的內政，透過短期且密集的蓄意人為操控及虛實難辨的特性，蓄意攻擊了民主政體下的開放社會，致而對若干國家政局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強大衝擊力道。從2014年的俄羅斯對烏克蘭屬地克里米亞的大規模網攻及滲透後而將之吞併、2016年俄羅斯對美國總統大選的干擾並影響結果，以及2018年中國網軍對台灣國內縣市長大選的強力介入及使親中勢力的獲勝，在在皆顯示出開放的民主政體在面對這種新型的大規模網路攻擊，以及地下資金全方位介入時所呈現的脆弱性。

於上所見之種種，迫切要務即在於如何能善用網路科技所帶來的便利性，與此同時亦如何能防堵其淪為專制政體遂行其政治野心的工具，遂成為當前民主自由國家的首要

之務。因此近一兩年來，當西方民主國家逐步了解到專制暨威權政體意圖以其政治野心而顛覆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及生活方式時，毅然決然地採行斷然措施，例如美國政府透過五眼聯盟：美國、英國、加拿大、澳洲及紐西蘭等五個英語系國家的情報交換，積極防制極權國家意圖藉由網攻及資金介入而達成其滲透及顛覆民主陣營的野心，其具體成效已在2019年5月18日的澳洲聯邦國會大選中，由本土派總理莫里森（Scott John Morrison）的聯盟派擊敗親中派的工黨而成功連任的選戰中呈現出來。

### 伍、柏林圍牆倒塌三十週年在香港反送中事件中的意義

當然開放社會下的民眾能夠洞察專制政權的網攻及監控之惡，進而為捍衛自身民主、自由及人權價值而不畏犧牲的起身抗爭，恐才是抵禦極權政體滲透、甚至摧毀開放社會及民主政體的關鍵力量。此由2019年上半年所掀起的香港反送中事件中尤可清楚地窺見。面對著中國共黨政權長期以來以「一國兩制」的名義下，而對香港的政經社層面施以全方位的滲透及企圖收緊香港愈受限制的自治權限，使得港人逐步意識到中國先前所允諾的所謂一國兩制，本質上根本是一項謊言，最終在反對港府意圖將刑事嫌疑犯直接解送中國審判的法案中，全面引爆港人的怒火，導致超過兩百萬人的走上街頭抗議港府意圖強渡關山的逃犯條例，是為「反送中事件」。港府在面對港人大規模抗議中不僅拒絕讓步，甚至在中共的授意下而對示威者施以無情的鎮壓行徑，遂引發嚴重的警民衝突事件，然而港人不畏數月以來付出數以千計的民眾在街頭上的受創、流血，以及被自殺的代價，始終秉持著不自由無寧死的堅定信念而與港警及其背後的中共政權作激烈的抗爭。時至今日，港人在付出慘重的傷亡代價之後，終而在2019年11月24日的區議會的選舉中民主派人士大獲全勝，親中的建制派議員則遭到史無前例的慘重失敗之後，在自助人助的狀況下，成功地博得了全球民主國家的輿論關注與同情，並促使了美國政府批准了《香港人權與民主法》（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使得港人的浴血抗爭獲得了一定程度的支持後盾，儘管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的現狀仍無法改變，卻也清楚地呈現出透過全球民主政體的緊密合作與不斷施壓，確能在相當程度上有效地遏止極權政體對開放社會肆無忌憚的滲透及顛覆之野心。

### 陸、香港成為新柏林：自由世界的新橋頭堡

這段港人艱辛的抗爭歷程中，許多港人甚至也將其自身抗暴行動，比喻為昔日柏林圍牆矗立年代中的自由價值對抗奴役狀態的鬥爭，香港民主派政黨「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於2019年9月9日在出席「柏林圍牆倒塌三十週年」的晚會活動中，將香港比擬為冷戰時期僅隔柏林圍牆且被東德全面圍困、卻始終屹立不搖地對抗共黨極權勢力的西柏林孤島，他對西方媒體陳述港人在港府及中國共黨壓迫下的不屈且浴血抗爭歷程，控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以皇帝自居，指使港府剝奪原先在一國兩制下承諾予港人的自治權限，最後他在與德國外長馬斯（Heiko Maas）晤面後向西方民主社會發出急切的呼籲，



祈求西方民主國家作為正堅守著自由世界橋頭堡的香港反送中的抗爭者的後盾，共同抵抗中國專制政權對香港示威者的暴力迫害，落實「與香港同在」的口號：「如果我們現在已處在新冷戰之期的話，那麼香港就是新柏林」。

由香港示威者以反送中事件的浴血對抗港府及中共專制政權，形容為昔日困守於柏林圍牆內仍堅持守護著民主自由的西柏林，象徵著港人捍衛自身原有自由的生活方式及不自由無寧死的堅決意志，就此一層面而言，昔日柏林圍牆內的西柏林所象徵的民主自由與人權的意義，在柏林圍牆倒塌三十年之後，再一次由香港反送中行動下的港人爭取自由行動所承載，儘管其前景在中共專制政體的持續高壓威逼下仍險阻重重，然而正如香港示威者在激烈抗爭中所展現的退此一步即無死所的精神般，已然使柏林圍牆倒塌三十週年的此刻，令自由世界正視到民主自由及人權的普世價值正面臨到嚴重威脅，務須採行斷然措施而維繫之，並起身對抗極權專制政權的必要及迫切性。此一發展，尤其值得同樣面臨國家未來前途走向的吾國人民上下為之深省的嚴肅課題。◆